

柏饼与槲包

杨月英

与中国传统节日使用阴历不同，日本自明治改历之后，端午节过的是阳历5月5日。4月中下旬的时候，超市里开始售卖一种用黄色或绿色的树叶包着的带馅糯米团子，称作柏饼，是日本过端午节的时令点心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并且非常管饱，有一阵经常买来当作早餐，常见的有灌馅、粒馅，以及白味噌馅三种口味。前两者都是甜的豆沙馅，区别只在于豆沙的质感不同：灌馅指灌去赤豆皮的细沙馅，粒馅顾名思义，指赤豆并不煮烂成沙，仍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。白味噌馅则是白芸豆泥里掺入了白味噌，甜中略带着一点咸味。白味噌以西京（即京都）出产者知名，日本超市里售卖的味噌，常以“西京白味噌”作为卖点，因此，白味噌馅的柏饼也被视为西京风味的时令点心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白味噌馅的，尝起来的感觉，比豆沙馅纯粹的甜味层次感更丰富一些。

这种糯米团子所以得名柏饼，是因为外层用了“柏叶”来包裹。然而实际上，日语里的柏，写作假名是かしわ，所指的是拉丁名为 *Quercus dentata* 的槲树，而非中文里往往和松树并称的柏树。槲字的日语假名也作かしわ，和日语里的柏字发音相同。在日语中，槲字不常用，大约就因此被同音的柏字取代了。中文语境里的柏树，日语用汉字“桧”来表示。《本草纲目》里称：“柏叶松身者，桧也。其叶尖硬，亦谓之栝。今人名圆柏。”可知桧在中文里指柏科植物，但未必如李时珍所言专指圆柏。古诗文中，桧常常用来和松并称，语义同松柏，比如苏轼的诗句“三年归来真一梦，桥山松桧凄风霜”，即是如此。桧字在现代汉语里很少用到，但日语中仍常见。日本的神社、寺庙多用柏木建造，重建的时候请信众捐钱，募捐告示里写明捐款将用来购买建筑材料的桧皮、桧木，也就是汉语的柏树皮、柏木。柏树皮的作用里是铺设屋顶。

要而言之，中文里的槲树，在日语里写作柏（常用）、槲（基本不用），日语的柏、槲发音相同；指柏科的植物时，中文用“柏”字（常用）、“桧”字（现代汉语不常用），日语则不用“柏”字（已用来指槲树了），专用“桧”字。这是汉语和日语之间存在的汉字与语义不一致，造成容易混淆的情况。

日语中使用汉字名称的动植物名，所指称的事物与汉字原意大相径庭，类似的语例并不少见。阅读没有拉丁名对照的古典日本博物学典籍时需要加以留心，若是望汉字而生义的话就容易出错。

槲树为壳斗科栎属植物，叶型宽大，边缘呈波状纹，用来包裹小点心正合适。而柏科植物的特征是叶子为鳞叶或刺叶，如常见的圆柏、侧柏、刺柏等，皆叶型狭小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用途。《北史·倭国传》提及当时日本的风俗，有“俗无盘飧，藉以槲叶，食用手哺之”的记载，是用槲叶包裹食物的最早记载。槲树新叶长成

后，老叶并不同时脱落，而是老叶新叶共生一段时间。在日本风俗里，认为这是子孙繁荣的好意头。柏饼从江户时代开始，成为风靡日本的端午时令点心，除了形式上保留用槲叶包裹食物的古风之外，也因为这种讨口彩的涵义。商家制作柏饼时，用黄色、青色的槲叶来区别不同的馅。

《北史·倭国传》里所谓“俗无盘飧，藉以槲叶”，这一说法并不准确，比如日本绳文时代就是以出土绳文陶器而得名，可知古代日本并非如《北史》所记载没有餐具，而是在生产力不高的古代，使用当地常见的植物包裹食物，一来取之方便，二来也有藉着植物的清香，来使食物获得特殊风味的用意，我国的荷叶饭、竹筒饭亦是如此。古代因地制宜的风俗，保存到如今便成了各地的特产。

古文献里提及我国古代用槲叶包裹食物的记载寥寥无几，倒是关于槲叶衣裳的诗文相当常见，比如陆游



①毛利梅园《梅园草木花谱》：槲（日语中称作柏）
②黄米馅槲包和糯米赤豆馅槲包
③毛利梅园《梅园草木花谱》：柏
④柏饼



现代传媒无远弗届。靳文翰先生的哲嗣靳子兄定居美国，在微信上看到《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》（2019年3月29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），去夏归国，辗转找到了我。在卡德公寓的交谈中，他澄清了拙文游移的史实，补充了未及的軼事；返美后传来了家藏的其父书迹与自己的忆文。我感到有必要补写这篇追记，既订正文本的疏误，也丰富靳文翰的形象。

一

靳文翰自幼长在北京，也确如其说，“三十年代初，余负笈东吴大学”，那时的东吴校长杨永清乃其父靳志的好友，特许他免学费就读。他晚年书迹录有在学期间的绝句，落款说：“五十年前负笈东吴时《姑苏杂诗》之一，壬戌閏四月”，壬戌是1982年。其诗清新悃诤：

流水小桥过女墙，先生来去水云乡。南东灵气清如许，都付春风发海棠。

尽管如此，靳文翰却想回北京。1932年，他自作主张借助其父的关系返京寄读于燕京大学，还帮好友、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徐迟搞了张转学假证明（半年后事发，徐迟重回东吴）。一学期后，他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，转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。1935年毕业，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院。

全面抗战爆发，靳文翰携恋人衣家瑛一路播迁，南下昆明，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，次年衣家瑛毕业。直到赴加拿大留学前，两人生活在一起。据1939年8月22日《顾颉刚日记》，云南大学教师朱宝昌请饭，邀请顾颉刚、靳文翰与衣家瑛等四人；五天后又记及“遇靳文翰夫妇”。据靳子兄说，其父1949年10月才正式结婚，新娘吴缙文出身安徽世家（其曾祖吴毓兰《清史稿》有传），上一年刚毕业于靳文翰执教的东吴大学法学院。昆明期间，靳文翰携衣家瑛同

赴饭局时两人并未结婚，却令顾颉刚误解为夫妇。靳文翰对发妻从未隐瞒过这段交往，但始终深藏着这段恋情。靳文翰去国后，据《吴宓日记》吴学昭注，衣家瑛曾赴重庆歌乐山国药专任教，抗战胜利后返回吉林故里，“因婚姻的不幸深受刺激，患精神分裂症，直到去世”，年仅33岁。靳文翰晚年书迹里，有一幅录明清之际今释澹归的《风流子·咏上元风雨》，落款题云“忆亡友衣家瑛，庚申清明前一日”，条幅上端仍钤着“偶然留鸿爪”的椭圆印。庚申是1980年，距衣家瑛去世已31年，靳文翰显然借他人之酒杯，浇心中之块垒：

东皇不解事，颙风雨、吹转海门潮。香烟火光微，心灰风蜡；笙歌声咽，泪满鲛绡。吾无恙，一炉焚柏子，七盃覆松涛。明月寻人，已埋空谷；暗尘随马，更拆星桥。

素馨田畔路，当年梦、应有金屋藏娇。不见漆灯续焰，蔗节生苗。尽罩绕珠围，寸阴难驻；钟鸣漏尽，抔土谁浇？问取门前流水，夜夜朝朝。

叶恭绰在《广篋中词》里以“痛切”二字点评这首词，其中不少词句同样触发靳文翰的“痛切”感，激起我们的联想力：随着远赴枫叶之国，他俩恋情也“烟火光微，心灰风蜡”，“笙歌声咽，泪满蛟绡”则恍若分袂之际的真实写照；历经沧桑，旧情缱绻，获悉的却是伊人消殒，落得“明月寻人，已埋空谷；暗尘随马，更拆星桥”；直到晚

《剑南诗稿》里的“槲叶为衣草结庐”，以隐士自况，把拾取槲叶连缀作衣和结草为庐作为隐逸的象征。槲衣的用法和荷衣相同，在古典诗文之中，成为隐士服饰的代名词。《南史》中有一处记载，似与用槲叶包裹食物有关：

《南史·乐预传》：“预建武中为永世令，人怀其德，卒官。时有一媪年可六七十，担槲蕈叶造市货之，闻预亡，大泣，弃溪中曰：‘失乐令，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耳！’市人亦皆泣，其惠化如此。”

建武是南朝宋明帝的年号，当时乐预在永世县（今江苏溧阳一带）为县令。乐预在任上亡故时，有老妪挑着一担槲蕈叶到集市售卖，得知乐预的死讯大哭。槲指槲叶，蕈是野菜의总称，如《醉翁亭记》里的“山肴野蕈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”。但这里把特指的槲叶和不特指的野菜相提并论，有语义未惬之感。

《尔雅注疏》中有“朴橄，一名

心。某氏曰：‘朴橄，橄櫟也。’……故郭云：‘櫟，橄别名。’”据此，櫟和橄为同一种植物，互为别名。《南史·乐预传》提及的“槲蕈叶”，更可能是指槲橄叶，也就是槲叶。“蕈”与“橄”字形相似，造成了讹误。槲叶是一种质感较硬的树叶，口感坚韧粗糙，无法作为蔬菜食用，和野菜并称颇为奇怪。如果理解成像如今菜场里出售粽叶一样贩卖槲叶，意思就通顺许多。

清初孙廷铨著有《颜山杂记》，记载其家乡山东颜神镇的山川风物，书中提及“四月蚕熟槲叶长，皆取叶裹粟、米、面、山花，作角食”。粽子古称角黍，《颜山杂记》中的这段文字，讲述的就是当地用槲叶包粽子的制作方法。

豫西一带的端午节，有着吃“槲包”点心的风俗，槲包也被当地人称为槲包粽子，有黄米槲包、糯米赤豆槲包等数种口味。古代的粽子用黄米作食材，到了后世，糯米粽取代了黄米粽的地位。黄米槲包口感很有嚼劲，又有黄米的清香，味道既复古又好吃，非常有特色。

《北史·倭国传》中，把用槲叶包裹食物视作日本风俗；而据《南史·乐预传》老妪售卖槲叶的记载，很可能在差不多的时代，我国也有购买槲叶用来包裹食物的吃货。如今，中国的槲包和日本的柏饼各自是当地的端午时令点心，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可爱吃货们，对于吃的追求可以异曲同工到这样的程度，想到这一点，忍不住会心一笑。

友人陶老有誉儿癖，另一友人老徐则好责其子。

陶老誉儿，并非常人那样，夸耀儿子入了哪所名校，考试得了几分，竟赛得了几名，乐器过了几级，外语会了几门。如此炫耀，究其实是在展示自己的钱柜。可陶老没钱，也不以寻常胜负为意。每每高兴且“炫耀”的，是儿子出今入古，提出刁钻的问题，难倒了老父亲。小朋友痴迷围棋，陶老便写诗，教诲儿子“长气要如人养气，偏师大可敌雄师。宁从失处争先着，莫为收官便乱吹”。他人以为这是教子，我却知他实是誉儿。从前杜甫夸幼子宗武“问知人客姓，诵得老夫诗”（《逢兴》），又谆谆诲以“诗是吾家事”，“精熟《文选》理”（《宗武生日》），诲之即夸之，以其能传衣钵也。陶老也是诗人，心事自可例而推之。又小陶孩提时，一如其他小孩，爱在纸上乱涂乱画，有时丹青盈纸，有时只是一线缭绕，皆旋即弃去，毫不可惜。陶老因此作偈子，谓秋风摧折草木，全无怜惜，可见造化成毁世界，只如小儿一般。比造化于己子，那陶老岂非造化的爸爸？当时看到此诗，我不由得赞叹，陶老陶老，棋高一着啊。

老徐却是责子派。日常埋汰“犬子”，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同样是下棋，他说：“上午陪小徐下了两局象棋，爷俩不欢而散……”他替奶奶告乏：“小徐打电话打得连奶奶都听得不耐烦了……”他嘲笑儿子不识字：“小徐拱进书房，看到摊开的地图集，念道：滚州、豫州、扬州……”嘲弄儿子的成绩：“看到班级群公布的成绩信息，竟然还有考得比小徐差的，某人乐坏了……”他也记录儿子的反击：“独坐客厅，听着外面的雨声，喝酒发呆。屋里传来小徐的声音：你别看爸爸整天把论文摆在电脑上，也没看他写几个字……”“在书房正准备看几页书，他拱过来说：‘爸，等有时间我教你练练书法哈！’小徐大师昨天才去上了第一节书法课……”“昨天指导小徐语文，修改之前作业中的错误。今天，接他回来，说是改了也没改对。俺抱怨说这答案应该没問題，不一定非用那个‘标准答案’。小徐叹气曰：你还是面对现实吧……”

老徐不写诗，但喝酒的嗜好跟陶潜是一样的。陶公正好写过一首《责子》诗，“抱怨”五个儿子又懒又笨，只知道玩。黄庭坚评说：“想见其人岂弟慈祥，戏谑可观也。”清人温汝能却批评黄洛翁“强作解人”，以为这是陶前县令“无可如何”之辞（语见《陶诗汇评》卷三）。看来温汝能缺一面陶老这样的父亲，也没有老徐这样的朋友，与陶渊明大有隔膜。

我喜欢陶、徐二位“小世兄”。在这个乏味的世界上，他们生长得很生动，因为他们生长的方向是心性的宽广。某次去陶老家聊天，见到小陶正奋起“金箍棒”，要与爸爸对打。不久陶老戏做“新年规划”，其中一条云“戒打儿子”。不知道他人什么反应，我脑海中的画面不是贾政狠狠打宝玉，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
微信二维码

誉儿与责子

刘摩诃

而是李靖苦苦斗哪吒。而且陶老有一首《书《西游记》后》诗，其中写道：“我于古通德，所最爱者菩提师。既授弟子七十二般变，又以筋斗云终之。其意盖云打不过即跑也，何必抵死放脸皮。天地多妖魔，斗战不胜亦有时。肥遁十万八千里，毫发无损谁能追？见道贵解脱，困守无乃痴。彼末数数然，何如此老神动而天随。”想来小陶世兄早得其父真传，倘有“斗战不胜”的时候，必是早早肥遁，安会困侍老拳？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曾经写诗祝福友人新出生的孩子：“愿他的心性是和乎宁静，/又能坚持真理，像天使海鲁文”；“愿他勇敢而大胆地正视/虚伪的荣华、人世虚伪的名声”；“愿他能拔出人世的泥淖，/心灵依然纯洁，胸襟依然无损！”（余振译）这也是我对小陶、小徐两位小朋友的祝福和期待。

我也认识别的一些小朋友，对他们，往往可怜多于喜欢。大概因为他们的父母炫耀他们却不懂得赞誉他们，居高临下批评他们而非朋友一般与他们相戏谑。一百零一年前，鲁迅先生发表了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，他说，先觉醒的人当“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。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一百零一年过去了，“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的中国人变多了吗？也许吧。至少在我认识的不多的小朋友中，像小陶、小徐那样的也还有那么一两位，比例似乎不低。只是，我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所言父母当“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这一说法。这样的人，大概是不会要孩子的。而父母为了孩子肩扛重压深感痛苦，孩子会快乐吗？陶老与老徐，他们与人世固然有许多齟齬不合，却又都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，这才是孩子们快乐的原因吧。

对了，老徐的公子大名“一芥”，这是我起的。取义于《维摩诘所说经》“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”，即一颗小粒的草子中藏得下三千大千世界。我虽微小，我心却广大无垠。对徐、陶两位小世兄的心量，我是很有信心的。

今岁何幸手足情，鞭火迎春在北京。圆明旧址共一游，拳棋书画结同心。

除了结伴同游圆明园废墟，还一起喝酒清拳下围棋（其赠国骏诗有“醉酒猜拳情意浓”，“棋逢对手笑争锋”），共话燕京旧梦，回忆逝水往事（赠国霞诗有“而今燕京旧梦温”，“多少往事流水奔”）。从诗作与跋语看，靳文翰心情是畅悦的。艾琳的后续故事，因当事人都已去世而无法完整复原。据张国和讣告（艾琳其时健在，讣告应经其过目），他和艾琳初见时，艾琳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中国史专业，“对孔孟理论的了解甚有过于他”，而张国和曾“演倒立向她求婚”（蒙靳子兄提供中译），1948年喜结连理。有理由推测，张国和与靳文翰曾经交往，在赢得艾琳芳心或许也起过作用。1982年，张国和退休后与艾琳曾来上海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过一年。其时程应镠先生主政历史系，与靳文翰或各有居停中介之力。

1985年，靳文翰受美国格林奈尔学院（Grinnell College）之聘，以“希斯”客座教授（Visiting Heath Professor）偕夫人赴美讲学；次年执教于康涅狄格州的三一学院（Trinity College），与艾琳夫妇颇有往还，两家保持着纯挚的友谊。又过一年，靳文翰从复旦大学退休，1990年代其夫人移居美国康州，他便往来于中美之间，位于纽约市郊的艾琳家成为他来去时的落脚点。在康州居住时，他过段时间就会开车去艾琳家叙旧聊天。这种生活状态延续到他1997年再次赴美，其时他已85岁，子女不再放心他独自驱车去艾琳家。这次，他只待了两个月，就返回上海，再也没去过美国。

2000年五月初一，他在卡德公寓再书那首“芝城旧事”的追忆之作，距其去世不足四年。后人已难猜测，他归国原因之一，是否与再也不能自驾造访艾琳家有关。但可以肯定，对靳文翰来说，这段“偶然留鸿爪”的“芝城旧事”是萦怀终生的。

追记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

虞云国

年，他依然忆起春城那“素馨田畔路，当年梦、应有金屋藏娇”；但这段感情却无果而终，“不见漆灯续焰，蔗节生苗”；一切早已结束，她的坟头“抔土谁浇”？唯有他，心底的思念犹如“门前流水，夜夜朝朝”。

这年清明前五日，靳文翰还手书朱彝尊的《高阳台》，从朱词有“重来已是朝云散，怅明珠佩冷，紫玉烟沉”与“动吟处，碧落黄泉，两处谁寻”云云，与追悼衣家瑛也应有关。同日，他还抄录《沈园》两首，借放翁至死不忘唐琬，表达对昔日恋人的无尽思念。

二

靳文翰在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行政法，1943年获法学硕士学位。其父靳志闻讯，手书自作七律，其序云：“书赠诗一首寄加拿大，送刘琴五加拿大履新馆长，男文翰留学彼土，思得奖学金，转入美国哈佛，赋此称意。”琴五为中国首任驻加公使刘师舜之字，诗迹就是托他转交的。首联说“冠剑雍容接上游，送君直到海东头”，结句云“项斯尚肯逢人说，离风清声老凤羞”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；诗还勉励他“乐处不飞真冻雀”。拿到学位当年，靳文翰便南下美国，但最终没能转入哈佛，而是进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，继续攻读英美法。连续两个夏天，他相继在华盛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美军太平洋战区特

别训练中心教授中文，暑假结束再返芝加哥大学，并在东亚学院兼教中文。1945年，他曾兼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。而“芝城旧事”就发生在这几年间。

那首“惊鸿照影”的七绝作于1980年，这有他另一幅落款“庚申春日偶成两首”的手迹为证。其一即前文过录的那首，那位女士就是他美国房东的女儿Irene（中文名“艾琳”），双方感情已进入订盟三生的阶段。但一封国故飞鸿促成靳文翰决计归国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驰函聘请他任教。异国学生与房东女儿之间的罗曼史只留下一段照影春波。《庚申春日偶成》其二如下：

杜宇声声唤他“不如归去”，三四两句追忆了挥袂诀别的当年情景。

回国以后，靳文翰即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英美法（前文据《吴宓书信集》吴学昭注，误记他一度受聘清华大学研究院），不久在圣约翰大学兼授政治学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这两所大学因系私立大学与教会学校被撤销，他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，专业也从法学与政治学改行世界史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中美关系恶化，他与艾琳中断了联系。终于等来了两国建交，次年艾琳就飞来中国，与他久别重逢，时距分手已32年；她也早为人妇，“绿叶成荫子满枝”。1981年，靳文翰

的女儿由艾琳资助赴美留学。

颇具戏剧性的是，艾琳的丈夫张国和与靳文翰竟是旧友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，东吴大学法学院大一学生张国和投笔从戎。1945年8月，他以王耀武军外处上校联络官身份参与布置芷江受降会议（《华西坝的传奇：曾振家一两次译员经历》，见http://www.pinlue.com/article/2018/09/1914/477301980901.html）。次年春，张国和取得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，随即考取教育部自费留学资格。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，进入联合国担任翻译直至退休。靳文翰与他是东吴大学法学院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二料系友，但无论哪所大学，他俩都没有时间上的交集。而据靳文翰晚年诗迹，他在国内时与张氏兄弟就有交往。其诗稿有跋语说：“和兄弟三人不相见者如参与商，今四十年来首次共度新春于春明，喜国事之兴隆，家人之团聚，遂各为一绝，以志雪鸿泥爪之迹云尔。辛酉上元前九日。文翰为国和书于上海。”辛酉乃1981年，这年春节前，张国和回国，邀靳文翰同住北京，与其弟国霞、国骏共度新年，正月初六（即“上元前九日”）前两人返沪，靳文翰赠三兄弟各一绝，“为国和书于上海”。从所说“四十年来”推断，靳文翰从沪淡起碇前往加拿大前，或与家居上海租界的张氏兄弟见过面，时为1940年8月。1981年，他赠张国和诗云：